

章學誠之外—— 杜定友《校讎新義》與民初目錄學的重構

丘文豪*

二十世紀初，在目錄學逐漸建立為一門現代學科的時候，多數學者本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賦予目錄學「學術史」的任務與責任。圖書館學者杜定友在1930年出版的《校讎新義》，一直被誤判為這股學術史式目錄學潮流中的代表。本文將指出，杜定友其實極力反對目錄學擔負學術史的責任。他認為，現代目錄學之本質與任務應該是以書籍為主的資訊登記，方便圖書館與讀者稽查與利用。若在目錄中摻入學術歷史源流的考量，將阻礙甚至抵銷目錄本來應有之功能。不同於杜定友極力劃清目錄與學術史的界線，其他投身目錄學與圖書館建設的學者都不同程度，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吸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杜定友與他們的差異與爭論，看似新舊與中西的衝突，但其實是建設「現代」目錄學與圖書館學的過程中，兩種對學術資訊管理的不同構想與實踐。同時，雙方的差異也反映了學者如何面對中國目錄學的學術遺產與遺留下的問題。

關鍵詞：杜定友、《校讎新義》、目錄學、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一、前言

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們在目錄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多高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口號。他們設想了一種從傳統延續到現代的目錄學理念，認為目錄不能僅為「簿記」，應該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目錄學的意義不僅在於記錄書籍本身的存在，更有作為「學術史」的意義。這不僅是中國傳統目錄學之本質，更應該是建設現代目錄學的核心宗旨。然而，當時其實還存在著另一股相反的聲音，卻被視為這股潮流的同調，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¹

¹ 關於中國傳統目、錄與目錄學的發展，請見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 1-10。儘管對於章學誠（1738-1801）學說的理解各有差異，一般支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個理念的學者，多祖述章學誠的說法。當代學者如戴聯斌也採取章氏的說法，認為傳統中國的「校讎學」不僅是「目錄學」，而包括版本、目錄、校勘，並以校讎對應西方的 bibliography。Lianbin Dai (戴聯斌), "China's Bibliographic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Book History* 17:1 (2014): 2。為避免混淆校勘意義下的狹義校讎，本文在近來資訊史研究的啟發下，將目錄學 (bibliography) 定義為：依據某種原則整理資訊的技術，以及整理後的成果。因此，本文以目錄學指稱章學誠的校讎學，以及受西方各種目錄、書目學影響的目錄學。關於目錄與 bibliography 的簡單定義，請見 Bruce Rusk, Xiao Liu (劉曉), "Bibliographies and Indices,"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 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475。另外，筆者也受到 Ann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的啟發。該書副標題，正揭示了學術資訊管理的重要面向。Blair 為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撰寫的前言，亦簡潔地說明了資訊史的研究脈絡與特點。Ann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n Blair, "Foreword,"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 Jack W. Chen, Anatoly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論述傾向於懸置書籍實物上的各種難題，部分從事圖書館實務的學者便別尋蹊徑，找尋目錄學的另一種可能性。他們是杜定友(1898–1967)、沈祖棻(1883–1977)與劉國鈞(1899–1980)等圖書館學學者。²現代目錄、索引與卡片，甚至是電腦搜尋系統出現以前，要在圖書館尋找與核對館藏書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們的目錄學著眼於實務層次，聚焦於資訊登記與管理的一面。在美式圖書館學的訓練與影響之下，他們細緻區分目錄(catalogue)、書目(bibliography)與著述史(literary history)的差別，不同意目錄與校讎兩個概念的混用，不願以書目一詞含括目錄，更反對將學術史的任務加諸於目錄之上。³換言之，相較於其他目錄學者，圖書館學者們意識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理念與圖書館實務之間的張力。其中，在菲律賓獲得圖書館學學位的杜定友，是表述最為明確、強烈且尖銳的一位學者。他在1927年撰寫、1930年出版《校讎新義》，⁴批判當時同樣致力於建設現代目錄學，卻不同程度認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理念的知識分子。杜定友以章學誠(1738–1801)為標靶，⁵清楚地揭示學術史與資訊登記之間不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xv–xvi.

² 丁道凡，〈序二〉，收入沈祖棻著，丁道凡搜集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棻先生文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頁5–6。

³ 劉國鈞，〈圖書目錄學概說〉，收入劉國鈞著，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39–41。

⁴ 易凌、龔蛟騰，〈《校讎新義》的成書、版本與傳承考略〉，《高校圖書館工作》，2021：6(長沙，2021)，頁84–91。

⁵ 除了本文討論的杜定友外，如目錄學家余嘉錫(1884–1955)也一方面繼承章學誠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對章學誠的諸多看法提出批評。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收入余嘉錫，《余嘉錫著作集：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書章實齋遺書後〉，收入余嘉錫，《余嘉錫著作集：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下冊，頁615–624。余嘉錫對於目錄學的定義多有衝突之處，而這些衝突其實涉及對於多個問

可妥協的矛盾。⁶

關注中國目錄學發展的研究者多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傳統視為中國目錄學的核心。他們輕視甚至忽視單純資訊登記式的目錄學實踐，因此未注意到目錄學理念間的矛盾與衝突。以戴聯斌為例，他認為中國目錄學傳統著重學術與思想層面，相對缺乏西方 Bibliography 對書的物質細節與出版訊息的重視。⁷他的判斷低估了明清時期大量以清單形式呈現、僅簡要記錄版本與物質資訊的目錄學構想與實踐；也忽略到了清代，這類偏重物質與版本資訊的目錄形式，其實與強調學術判斷與意識形態的目錄體系相互影響與滲透。⁸這導致他主張須借助二十世紀初考古學成果，以補充書籍的物質細節，方能推動出

題的考量，需要進一步梳理，在此暫時無法深入討論。關於余嘉錫目錄學思想在當時的流傳，可見：嚴佐之，〈前言〉，收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8；嘉瀨達男，〈余嘉錫『古書通例』『目錄學發微』の版本と成立過程〉，《人文研究》，124（小樽，2012），頁231–260。

⁶ 相較杜定友，沈祖榮對傳統藏書樓的功能與章學誠的主張就持較為平和的態度。劉國鈞雖反對四部分類法，也指出以檢查為目的的目錄，與辨章學術，剖析流別的學術史的不同，但也沒有激烈批評後者。沈祖榮，〈我國圖書館事業之改進〉，收入沈祖榮著，丁道凡搜集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頁179–183；劉國鈞，〈圖書目錄學概說〉，收入劉國鈞著，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頁39–41。

⁷ Lianbin Dai, “China’s Bibliographic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1–50.

⁸ Fan Wang (王璠), “The Cornerstone of Scholarship: Library Catalogu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rivate Libraries and their Documentation, 1665–1830: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Sources*, ed. Rindert Jagersma, Helwi Blom, Evelien Chayes, and Ann-Marie Hansen (Leiden/Boston: Brill, 2023), 349–367; 湯綯，《清初藏書家錢曾研究》（臺北：漢美出版社，1991）；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北縣：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藏書家與古文獻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劉蕃，《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56–57、200。

版史、書籍史與閱讀史的研究。這一提議固然具有啟發性，但其對中國目錄學傳統的整體判斷，仍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另一方面，探討中國近現代目錄學的發展、現況與未來的學者，儘管指出近現代目錄學開始往單純訊息傳遞與管理職能的方向發展，但也仍強調其繼承與發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遺產，以及指導讀書門徑的任務。⁹

近來西方學者開始注意中國如何面對資訊管理的問題。然而，這些研究主要聚焦於現代資訊與新文類的衝擊，以及具體的應對方法，並未深究管理資訊時的根本原則與理念層次上的差異。¹⁰至於相對重視圖書管理的研究，多半是在現代化與中西衝突架構下進行，而低估同為「現代」立場者的差異與衝突。¹¹對於杜定友的討論尤其如此。

⁹ 李立民，《晚清目錄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頁329–330；柯平，〈中國目錄學的現況與未來〉，收入柯平，《從文獻目錄學到數字目錄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13；彭斐章等著，《數字時代目錄學理論變革與發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頁25–26。值得注意的是，柯平與彭斐章皆為圖書館學家，學術專長兼顧當代圖書資訊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¹⁰ T. 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7): 247–263; Mindi Zhang (張敏迪), “Organizing the New World of Print: Library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Business at the Commercial Press, ca. 1900 to ca. 1940,” *Twentieth-Century China* 50:1 (January 2025): 3–24.

¹¹ 英文方面，如易治賢與 Kim M. Thompson 將二十世紀的圖書館發展史，視為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忽視其中的張力。Jing Liao 採取衝擊 / 反應框架，強調西方圖書館與傳統中國圖書觀念之間的張力。現代中國學術圖書館是在這股中西張力中誕生。近來，*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是一本專門探討中國資訊整理的論文集。其中一篇關於二十世紀目錄學的專文，指出中國目錄與分類系統，為了因應西方知識的大量進入，開始調整與擴張。到了1920年代，「目錄」與「bibliography」連結，成為現代的科學，自此中國「目錄」成為現代圖書館科學的學科之一。然而，該文也沒有注意到不同的「現代化」方案間的衝突與矛盾。Zhixian Yi (易治賢), Kim M. Thompson, “A Case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Building of China’s

過去關於杜定友的研究與傳記主要集中在圖書館的理論建構與實務面向。¹²少數留意到《校讎新義》的學者則接受杜定友自身的說法，以新舊之爭解讀《校讎新義》的意義。目錄學的介紹性文字僅注意到杜定友反對傳統目錄學，批評「古典目錄學」的一面，並試圖淡化杜定友與傳統目錄學之間的衝突。¹³近年雖然有研究更細緻地介紹《校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 Culture* 50:1 (January 2015): 51–69. Jing Liao,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Academic Library in China: Western Infl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sponse,” *Libraries & Culture* 39:2 (Spring 2004): 161–174. Anatoly Detwyler, “Twentieth-Century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 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500–501. 中文方面，具代表性的左玉河一方面從學術分科的角度，說明西方觀念傳入後，中國傳統「七略」與「四部」，轉型為近代分科方式，以及各學科的成立。另一方面，也從體制的角度，指出傳統藏書樓轉型為近代圖書館。左玉河雖注意到「現代」之間的衝突，如他引用劉國均的說法，指出以五四運動為界，二十世紀有兩階段的發展，前者為效法日本，後者為直接接受美式制度與觀念。但圍繞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交鋒，則無法用「美、日對立」來解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特別是第六章「從藏書樓到圖書館：近代圖書館制度的建立」。目錄學方面，許多當代的目錄學史研究，多採取「新／舊、中／西」解釋框架。如倪梁鳴，《民國目錄學研究：以傳統目錄學為中心》（北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22）強調民國目錄學在西學的衝擊下，開始由傳統向近代化轉化。李立民《晚清目錄學研究》認為，清中葉以後傳統目錄學受西學以及圖書館學影響，開始發生流變。通論清代的專著，也指出同治（1856–1875）、光緒（1875–1908）以後，古代目錄學走向近代目錄學，並強調過程中的西方因素，以及中西古今之爭。陳曉華，《清代目錄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0），頁 279–281、349–352。

¹²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黃增章、楊恆平，《中國圖書館事業開拓者：杜定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¹³ 喬好勤，〈略論 1911–1949 年我國目錄學〉，收入彭斐章、謝灼華、喬好

讎新義》的論點，但也延續了同樣的論述策略。范旭艷採取知識轉型與傳統目錄學分化的角度，注意到《校讎新義》尖刻抨擊傳統、舊目錄學，並指出《校讎新義》批判四部分類，主張「中國無目錄學」與「中國無分類法」，區分書目、目錄、校讎等概念的特點。李勤合在目錄學現代轉型的角度下，比較劉咸忻(1897-1932)與杜定友的主張。他認為杜定友代表「西方學術中國化」的取向，並注意到杜氏否定傳統目錄學與「校讎」，區隔圖書分類與學術分類，以及分類法與目錄學的差異。¹⁴總之，學者雖開始注意到《校讎新義》抨擊章學誠「校讎」式目錄學的觀點，但他們仍從傳統目錄學與西方圖書館學對峙與衝突的角度，詮釋該書。

事實上，杜定友的例子顯示當時存在著對於「資訊整理」截然不同的兩種現代想像。具體而言，即是目錄到底要不要擔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任務，甚至是指導讀書門徑的責任？另一方面，若僅探討杜定友一人的思想，則無法定位其思想位置，並展現當時思想世界中目錄學構想的豐富樣貌。李勤合雖提及汪辟疆(1887-1966)、劉咸忻、姚名達(1905-1942)等其他目錄學者，但文章中僅以劉咸忻為杜定友之對照。實際上，民國初年討論目錄學的學者都有不同的關懷、目的與學科背景，而對目錄學有不同的構想。他們的學術脈絡與立足點差異甚大，儘管都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構思目錄學，但吸收的程度與策略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一概歸類於「傳統」目錄學

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彙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頁 322-326；全根先，〈杜定友的早期目錄學思想〉，收入全根先，《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家傳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 271-281。

14 范旭艷，〈杜定友《校讎新義》與傳統目錄學之知識分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廣州，2019)，頁 145-153；李勤合，〈「續」「新」糾葛：學術轉型中的《續校讎通義》與《校讎新義》〉，《儒藏論壇》，16(成都，2022)，頁 121-154。

者。因此，本文不但會指出杜定友從實務的角度，挑戰章學誠的理想，也會凸顯這些學者如何思考目錄學是否需要，且多大程度吸納學術史的任務。

本文首先集中解析《校讎新義》致力排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論述特點。接著，著眼於 1920 年代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作為學界熱潮，許多學者以章學誠的史學與校讎學為基礎建設現代目錄學，賦予目錄學「學術史」的神聖任務。說明這股強勢的看法，將有助於理解杜定友撰述的動力、目的與對話對象。最後，本文將指出在《校讎新義》出版並造成討論的同時，同樣關懷圖書館與目錄學的學者儘管更看重資訊管理的面向，卻不同程度地吸納、調和學術史與目錄學，不如杜定友般拒斥學術史式的目錄學。總而言之，本文認為杜定友《校讎新義》與當時的目錄學爭論，揭露了 1930 年代前後兩種面對學術資訊的構想與實踐，反映了現代學者如何面對章學誠的學術遺產，更蘊藏如何安排不同學科之主從順序的思想議題。

二、《校讎新義》的特點

《校讎新義》是一本容易讓人誤解的著作。杜定友在撰寫《校讎新義》以前並不使用校讎學來指稱目錄學，他一般也不採取文言的方式進行撰述。但在這本書中，他的行文仿古，拼湊痕跡頗多，有許多矛盾、跳躍與重複的論述，其中的論點甚至有無法完全貫通之處。¹⁵儘管有這些缺點，《校讎新義》立場又極為鮮明，仍有其可觀之處。杜定友從反對當時流行的章學誠典範出發，主張目錄學正是圖書「登

¹⁵ 當時有讀者批評《校讎新義》名實不符，混淆目錄與校讎，是「唾天以自唾」。陳振東，〈校讎新義商榷〉，《無錫國專年刊》，上冊(1931年5月)，頁80；武，〈校讎新義之命名〉，《大公報》，1936年6月25日，第11版。

記簿」，是圖書館之指引與嚮導。他致力與章學誠劃清界線，拒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堅決反對將目錄學作為一種學術史。在梳理其論點之前，有必要先簡略說明杜定友在當時的主要關懷。

杜定友在 1920 年代學成歸國後，極力爭取專業圖書館的生存空間，以及圖書館學的學科獨立性。他因此與其他投入圖書館事業與目錄學的知識分子發生衝突。¹⁶杜定友認為，當時社會普遍忽視與輕視圖書館的專業，有許多從事圖書館與目錄工作的學者，僅是飽讀詩書的「通儒」。¹⁷這些在杜定友看來不具備圖書館學專業知識的競爭者，往往攻擊杜定友中文根柢太差，不懂傳統中國目錄學與版本學。因此，杜定友於百忙之中發憤閱讀古籍，撰寫了這本他自己也認為是「毀譽參半」的著作，回應學術史式目錄學的觀點與批評。杜定友不無自我辯解地指出，《校讎新義》是刻意「咬牙詰齒、畀棄標點、分段零落、裝訂印式、古色古香」，以此吸引「老先生們」翻閱，進而動搖他們

¹⁶ 在此要強調的是，儘管杜定友將自己與對手劃分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對立，但他的競爭對手同樣也是以建設「現代」圖書館為目標的知識分子，只是雙方對圖書館的理念與定位有所衝突。事實上，1920 年代中國圖書館正在蓬勃發展，學者對於建設現代的美式公共圖書館有一定的共識，他們大多同意傳統藏書樓不能滿足新的需求，因此展開「新圖書館運動」，謀求中國圖書館的現代轉型。差別在於，各個學者對現代中國圖書館的想像不一，或主張全盤西化，或主張吸收傳統資源進行轉化。關於十九世紀末圖書館與藏書樓的競爭，以及 1920 年代中國「新圖書館運動」，可見 Jing Liao, "Chinese-American Alliances: America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yste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25:1 (March 2009): 20–32；王阿陶，《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頁 31–32，表 2-1。

¹⁷ 當時如梁啟超(1873–1929)、黃炎培(1878–1965)與蔣夢麟(1886–1964)等非圖書館學專業的知識分子，也藉由人脈與名氣投身於圖書館事業，並在圖書館學界擔任重要職位與角色。韓永進主編，《中國圖書館史(近代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頁 96–146。

的舊思想，打破舊目錄學的錯誤理論。¹⁸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杜定友創作了《校讎新義》這一本脫離其著述脈絡的著作。¹⁹

(一) 為現代圖書館服務的「簿記之學」

杜定友的核心關懷為圖書館的獨立與專業性，目錄是輔助圖書館運作與使用的關鍵工具。他認為目錄的定位與功能相當簡單，1924年已經指出：「目錄者，圖書館之鎖鑰也。為閱者與書籍之聯絡機關。」杜定友此處所言之鑰匙，就是指讀者需要透過目錄，解決使用圖書館時的實際問題：找到無論已知或未知的需求書籍。²⁰在杜定友眼中，所謂「圖書之指南及嚮導」，²¹指的是具體「找到書」，而不是晚清以來流行的學習階梯與讀書指南。²²換句話說，目錄學是連接讀者、

18 杜定友，《百城生活》(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18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158、160、167、179、221-222。

19 關於杜定友著述的整理與統計，見程煥文，〈序〉，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1冊，頁27-28。

20 這些問題包括：「1.館內有某人所著之書否？2.館內有某書否？3.館內有某種類之某書否？4.館內有某種書否？5.館內有對於某問題之參考書否？6.某書在何處？」杜定友，《圖書目錄學》(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2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163。

21 杜定友，《圖書目錄學》，頁166-167。

22 這類看法以張之洞所言影響力最為深遠。張之洞認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讀羣書的門徑」，讀過就可以「略知學問門徑矣」。現代學者余嘉錫與張舜徽(1911-1992)，也延續張之洞提出類似的看法與實踐。張之洞，《輜軒語》，收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第12冊，頁204；余嘉錫，〈序錄〉，《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46；張舜徽，〈自序〉，《四庫提要敘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1。

圖書館與圖書之間的一種「實用」的「工具」。他認為中國傳統混淆了「目錄」與「分類」，中國僅有「分類目錄」，因此他說：「向來編目者，只有分類入目為事，而不研究目錄之編制。不知圖書館之鎖鑰，在目錄而不在分類。」杜定友並不是單純以西方為標準批判中國的缺失。他實際上在意的是，這種混淆會影響圖書館是否能夠發揮作用。在中國的分類下，即使要找尋某些特定主題的書籍，讀者也必須先知道分類，才能達成目標。²³換言之，讀者必須有一定的學術熟悉度後，才能利用傳統分類法找到書。因此，傳統中國的書籍「分類」，並不能完善地輔助讀者與圖書館之運作。在《校讎新義》出版前不久，杜定友已強調圖書館目錄是指導閱讀的一種「工具」，而中國以往所謂的目錄其實是專研「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書目」。²⁴目錄與分類的區別，正是日後《校讎新義》的一大重點。

對杜定友而言，目錄就是「檢用之便」的「簿記之學」。他認為目錄是為了調閱的實務而生，如果摻入梳理學術史以及學術褒貶的任務，將抵銷甚至阻礙目錄本來應有之功能。²⁵他認為必須是以圖書為對象，以致用為目的，甚至如同「商店的貨物目錄」才是現代所需的目錄學。²⁶杜定友在作為《校讎新義》全書綱領的〈類例〉中，大膽宣稱：「我國目錄之學勝於考鏡源流，而亦誤於考鏡源流。」²⁷為了

²³ 杜定友，《圖書目錄學》，頁164、180-181。

²⁴ 杜定友，《圖書館學概論》（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3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339、355。

²⁵ 杜定友，《校讎新義》（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第42冊，上冊，上海：上海書局出版社，1991，據中華書局1930年版影印），卷1，〈類例〉，頁8a。

²⁶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5b-16a。

²⁷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3a。

論證這個說法，杜定友運用「古、今」與「書、學」對比的架構，並區別「目錄」與「書目」的差別。²⁸杜定友清楚表示現代目錄學者，不應該再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為編纂圖書目錄的宗旨。杜定友開宗明義地指出，為書籍設計類別並安排次序時，最重要的即是「分類」。中國從古至今雖然也有種種分類，但這些分類卻混淆了「書」之分類與「學」之分類的不同。杜定友指出，以往僅有學術之分類，而沒有專為書設計的分類，用他的話來說，便是「數千年來，有為學之人，而無治書之學」。²⁹古代目錄學者以學術分類為目標，再受到「學術源流」這個理想的暗示，加劇了書與學的混淆。他接著說到，古代學者分類時致力於辨章學術，因而忽略了圖書應用的層面。他強調，分類最大的目的是要方便讀者「即類求書」。³⁰總而言之，杜定友認為分類時混淆書與學，將會導致目錄無法為人所用。在前述應用的考量下，杜定友劃分目錄與書目的差別，將考鏡源流的工作分配給書目：「學之源流可得而考也，書之源流雖可得而考之，然非類例之責，書目之事也。」他認為書籍的分類重點在於：「辨章學術，部次甲乙，使圖書典籍按類而歸，以見學術之範圍，各科之關係。考鏡源

²⁸ 《校讎新義》沒有標明原文，但杜定友所言即是 *catalogue* 與 *bibliography* 的差異。日後他與弟子編纂的圖書館術語辭典有更細緻的解析與定義。范旭艷，〈杜定友《校讎新義》與傳統目錄學之知識分化〉，頁 151–152。但其實，杜定友在 1924 年業已在「圖書學術語」中，將 *catalog* 對應為目錄；*bibliography* 對應為書目。見杜定友，《圖書館通論》（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 3 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 53–55。

²⁹ 隨後，杜定友在第五卷討論四庫分類之缺失時，也指出「歷來目錄學者以書之分類與學之分類相混。蓋學術之分為七略、四部有可說焉。書之分為七略、四部，不可通也。」杜定友，《校讎新義》，卷 4，〈史部〉，頁 52a。

³⁰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 1，〈類例〉，頁 1b–2a。

流猶其餘事。」³¹在此，杜定友將一般合併看待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概念，切割為兩個部分。他認為辨章學術與考鏡源流為兩件事，在古代書籍稀少時或許可以同時達成，但當書籍越來越多時，混淆兩個不同的任務便會產生弊端。他強調這種情形在現代特別嚴重。³²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考究學術源流的工作應由書目來擔負，並非目錄的職責。

在杜定友的設定中，「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學者章學誠。杜定友批判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為了提出他心目中目錄學的真正意義與功能。杜定友不避諱地指出，目錄應該是章學誠所批評的「簿記」，並且「圖書部次，首重甲乙」，「今之目錄」必須有所編次，加以編號，如此讀者便可以「按圖而索驥，因號而得書」。經過這些步驟的目錄，才能便於讀者檢查書籍。³³換言之，在杜定友眼中，古代目錄都是「書目」，目的是學術之傳習，因此以考鏡源流為重，輕視部次甲乙與簿記之設計。這並不是杜定友心目中的目錄。他又指出：

目錄惟便檢查，於學術源流、文章派別，別無所與焉。……文人好高騖遠……是則目錄與書目之別又不分矣。甲乙紀數，此正為編目之要義。學誠未之辨耳。³⁴

此處，杜定友再次將矛頭指向章學誠，駁斥《校讎通義》將書目的學術責任，混入了目錄的單純任務之中。杜定友一再強調，「目錄」是以應用為目的，便於稽查，因此應該著重登記與編號，他具體指出目錄應該：「離書而獨立成表，部次詳明，有標記、有組織，能伸縮，

31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2b。

32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3a。

33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7a。

34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2a。

便增減，而與典藏出納為表裡者，不可得也。故曰中國無分類法。」³⁵總之，在古與今、書與學、書目與目錄的分判下，杜定友挑釁地宣稱「中國無分類法」。³⁶

杜定友清楚認識到，持章學誠觀點的目錄學者，認為目錄不能僅是部次甲乙，不但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更要在此基礎上，導引學者走向「正確」的學術方向。對此，他是堅決反對的。杜定友重申應該深入辨別書目與目錄：

或曰目錄之學，非徒部次甲乙而已也。亦將有以導學者乎。……
曰是書目之職耳，非目錄之務也。若必欲挫危扶正，當出於收書之慎、選擇之精。若即收其書，又貶其目，無是理也。³⁷

在此，杜定友又指出他所謂「現代」的、不同於「傳統書目」的目錄學，應該抱持的另一個原則：不存褒貶。杜定友一再強調目錄學最核心的功能，是為方便讀者找尋需要的書籍。因此，他指出：「現代之分類為搜羅一切文獻，分別部次以備選用。辨章流別，褒貶校讎，均非其責。」³⁸既然目錄之功能，是為了方便讀者「即類求書」，那麼便應該「有其書即有目」。過去目錄學者著眼於學術源流以及「存目」之設計，導致目錄有其目而無其書，使得目錄編次凌亂，失去其意義。³⁹在此，杜定友是從理論上發揮，當他在後幾卷探討四庫之弊病時，指出「傳統」目錄學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時，往往存有「門戶尊卑之見」。⁴⁰他也批評最具代表性的《四庫全書》與四部分類法，其實

35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13a。

36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12a。

37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3b。

38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5a-5b。

39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1，〈類例〉，頁4b。

40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4，〈史部〉，頁42a。

是以「衛道」為目的，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審擇」，「以圖書分類為褒貶之作」，如此便失去目錄學之意義與功能。⁴¹杜定友不厭其煩，再三強調這一論點，他說：「目錄所以簿記圖書，而便檢取也。此外無所用。」⁴²又說：「欲求檢用之便，則有圖書編目之法，所謂目錄學是也。」⁴³總之，杜定友從目錄之本質與功用，重新定義目錄學這門專業學問的內涵。杜定友直截表示目錄即是登記圖書，方便檢查與取用，除此之外別無所用。⁴⁴「此外無所用」一語將目錄可能蘊含的其他性質、功能與附加價值一筆抹消。

（二）目錄不是「學術史」

杜定友的核心宗旨其實很清楚——目錄學的任務就是單純地登記圖書，方便找書。在此之外，梳理學術源流、導引學術方向以及衛道，都不是目錄與目錄學的職責。杜定友在〈編次〉卷末首次採用「著述史」一詞，指出「考學術之源流」的著述史，同樣也與目錄、書目相混淆。⁴⁵他在〈書目〉則展開中國書目之混亂，以及目錄與書目應該擺脫「考鏡源流」的論述。

杜定友承認，中國歷來之書目非常豐富，且用途超出目錄簿計層次。然而，這些書目涉及類例、學術源流、校讎、版本、藏書、編目等任務，使得書目學、目錄學、校讎學、版本學、圖書學的界線與範圍都混而為一，其用途錯綜雜亂。⁴⁶其中，他最排斥的考鏡源流，自當由其

41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2，〈四庫〉，頁22a-22b。

42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a-1b。

43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b。

44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a。

45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6b。

46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8，〈書目〉，頁18a。

他專業來負責。他說：「自來目錄學者必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相標榜，以為非如是不足以尊其道也。不知學術源流之考鏡，當別撰學術史、著述史以總論之。」觀察本卷的論述脈絡，杜定友此處之目錄學是包含了前述的書目而論。整本《校讎新義》都在為目錄學與「考鏡源流」的任務脫鉤。在此，他清楚說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任務，應該是由「著述史」與「學術史」來擔負。他認為，正是因為勉強要在圖書目錄中兼及學術史的任務，因此發明互見、別裁等方法，⁴⁷又於分類之後以敘言的方式，敘述學術源流，這都導致書籍與目錄破碎支離，更加混亂，正是「著述史與書目學不分之過」。⁴⁸總之，杜定友反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加諸在目錄身上的「學術」與「歷史」負擔。

杜定友將書目分為八類，一一說明其功能與任務，但無一需要擔負梳理學術歷史的責任。⁴⁹筆者認為，其中兩類最容易讓讀者誤會書目與歷史有關：「史家書目」與「學術書目」。以下特別以此兩類為例，說明杜定友如何將考鏡源流革除在書目的任務之外。第一，杜定友指出史家書目是記錄一國一代之書，以此展現國家之出版狀況，以及書籍內容與學術進展。但他強調這絕非「切切於學術源流也」。這

⁴⁷ 杜定友在第七卷〈編次〉，雖不反對章學誠互見、別裁之法，但他仔細分梳其適用範圍。相對於章學誠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杜定友是出於便利找書的角度，認為分類上不可一書兩類，因為一本書只能在一個位置。但分類編目便可以同時在多個類別中註明書籍。簡言之，即是「能互見其類，不能互見其書」。因此，杜定友早已從目錄與索引的角度，設計「見卡」與「參考卡」，方便讀者查找書籍。杜定友，《校讎新義》，卷7，〈編次〉，頁10b-11a；杜定友，《圖書目錄學》，頁216-218；杜定友，《圖書分類法》（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2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328。

⁴⁸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8，〈書目〉，頁18b。

⁴⁹ 史家書目、學術書目、引用書目、書目之書目、版刻書目、書目考訂、書目解題、燬闕書目。杜定友，《校讎新義》，卷8，〈書目〉，頁19a。

種史家書目，僅是歐美的「國家書目」。換句話說，即是書籍之「年報表」與「月報表」而已。⁵⁰第二，杜定友認定學術書目甚為重要。但是，儘管學術書目為研究學術之工具，紀錄內容也包括學術源流，但其重點在於以各種分類、編年與排字，忠實地說明書籍內容與沿革，以備初學者瀏覽與資深學者進行研究。⁵¹杜定友對於史家書目與學術書目的解釋並不周延，但其實他的意思是強調，歷史與學術書目應該停留在客觀的紀錄，不能成為考辨與褒貶學術的著述史與學術史。

總而言之，杜定友的關懷是以圖書館實務為本的目錄學，單純化目錄的任務。正如一篇介紹《校讎新義》的文章所言，杜定友提出的不是「傳統的」目錄學，他提倡的目錄學應是：

科學方法管理之新圖書館內，所用的卡片目錄合櫃箱而言，專家稱之為圖書館的索引，是研究學問的鑰匙，指導我們尋找館中的寶藏，不是遺傳的劉向七略，荀勗四庫，和歷代藏書家的書本目錄。⁵²

因此，杜定友劃分目錄與書目，堅持目錄應該保持其最原初、單純的簿記功能與致用目的。他同時將其口中中國既有的書目分門別類，根據功能與目的細分為八項。但就算是書目，也無一涉入「歷史」的任務。杜定友的種種分梳，正是為了掃除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加諸於現代目錄學的負擔。接下來，筆者將說明章學誠的史學與校讎學理念，在 1920 年代的傳播以及對杜定友可能的刺激。

50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 8，〈書目〉，頁 20a。

51 杜定友，《校讎新義》，卷 8，〈書目〉，頁 21a。

52 陳友松，〈介紹圖書目錄學杜定友著商務書館出版〉，《申報》，1927 年 3 月 1 日，第 20 版。

三、章學誠式學術史目錄學的流行

1920、30年代，目錄學成為學者討論的焦點，高中與大學紛紛列為必修課程，課本與講義的需求也隨之增加。⁵³然而，當時的目錄學中、西、新、舊術語混雜，許多專有名詞與概念仍莫衷一是。⁵⁴這不僅是翻譯問題，更涉及眾人對於目錄學本質、樣貌與任務的深層想像。在這股目錄學討論風潮之中，章學誠思想主導了學界。據現有研究，章學誠與其文史理念在乾嘉時期(1735-1820)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迴響。

⁵³ 如1934年，汪辟疆提到近時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多列為必修科。但擔任講習者，苦無講義。汪辟疆，〈序〉，收入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1；姚名達指出，1925年商務印書館即邀請他撰寫「中國目錄學史」。姚名達，〈自序〉，收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1-2。整理姚名達著作的王重民也指出，自1937《中國目錄學史》出版至1957年，相關專著與論文不下二、三十種。王重民，〈後記〉，收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頁407。另外，倪梁鳴的碩士論文，整理二十世紀目錄學著作與論文的數量表，從表中可以看出，1922年相關研究數量暴增，一直到1940年才慢慢減少。倪梁鳴將目錄學者分為六類：創新派、傳統派、折中派、校讎派、古籍派、實用派。倪梁鳴也注意到，杜定友屬於創新派，主張中國之前的目錄學僅為學術史。值得注意的是，若用該論文的分類架構來看，除了「創新派」外，都對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理念，持友善態度。倪梁鳴，〈論20世紀中國目錄學成就〉(合肥：安徽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7)，頁136-139。

⁵⁴ 如1929年，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就有多位學者提案要求「訂定中國圖書館學術語」。他們認為中國圖書館術語涉及諸多西方專有名詞，各人翻譯多有差異，造成混淆，且中國固有之圖書館概念也無固定意義，容易與新譯名詞混雜或衝突。因此，急需統一名詞以利圖書館事業與研究的進行。參見李繼先、金敏甫、李小緣、萬國鼎原案，〈訂定中國圖書館學術語案〉，收入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委員會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南京：中華圖書館協會事務所，1929)，頁156-158。

膾炙人口的《文史通義》與「六經皆史」概念，是民初學者挖掘與發揚後，才迅速成為當時的顯學。⁵⁵換言之，在杜定友眼中來自「傳統」的「舊」阻力，不是一套自然而然、長久綿延且影響深遠的傳統理念，而是一股特殊的民初學術風潮。本文將描繪章學誠校讎理念，如何深刻影響與杜定友《校讎新義》同時期的目錄學討論。

(一) 作為史學附庸的「校讎學」⁵⁶

二十世紀初章學誠的學說相當流行，在中日思想界同時掀起風潮。在現代目錄學的建立方面，章學誠主要代表以目錄學為史學的傾向。⁵⁷

⁵⁵ 當時章學誠著作受到注目的程度，可以錢穆的回憶為例。1920年代以前，於小學任教的錢穆就相當喜愛《文史通義》，甚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他在夢中見到大量「世所未見」的章學誠著作。錢穆也指出，1930年代北京坊間頗流行《章氏遺書》的抄本。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2009），頁167-168。

⁵⁶ 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宏觀且全面地梳理章學誠及其學術，自內藤湖南（1866-1934）、胡適與梁啟超為濫觴，一直到當代的研究發展。筆者此處的討論，基本上以黃兆強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黃兆強的討論以章學誠的史學為核心，正反映了民初學者的研究角度與成果，集中於史學的歷史實況。

⁵⁷ 章學誠在中國民初學界的位置，已有眾多討論與研究成果。較早的有何炳松，〈何序〉、姚名達，〈姚序〉、胡適，〈胡序〉，收入胡適著，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章實齋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2020），頁3-27；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68-69。如桑兵指出，當時學者多採取經史對立的角度，在史學專業化的訴求下，以章學誠的文史思想接引西方學術。另外，在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全書中引及的相關討論，也可以發現1920至1940年代初，對章學誠的討論集中於「六經皆史」、「浙東學派」以及章學誠與劉知幾的比較，這類偏向史學的命題。桑兵，〈分說：分科的學史與歷史〉，收入桑兵、關曉

當日錄學者討論章學誠時，往往把他塑造為史學專家。章學誠投注心力的校讎學，則被視為第二義，只是為了更高層次的「史學」的意義而服務。⁵⁸首先，1929年，呼應當時眾人閱讀章學誠的風潮，擔任國文系教授的錢基博(1887-1957)撰寫了《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在這本導讀式著作中，錢基博介紹章學誠及其思想體系時，強調史學家與史學的面向，認為校讎學從屬於《文史通義》的史學。⁵⁹接著，1930年代，歷史學家呂思勉(1884-1957)在上海光華大學歷史系開設「史學名著選讀」，課堂講解《文史通義》並著有《文史通義評》。⁶⁰呂思勉也是在史學的角度下

虹主編，《分科的學史與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49-51；黃兆強，〈附錄二：章學誠在同時代人眼中的看法及相關問題編年研究〉，收入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1920-1985》，頁385-390。但是事實上，當時學者對於章學誠學說有著諸多的取捨、詮釋、想像甚至是誤讀。如宋家復與許松原就注意到，胡適、梁啟超、姚名達、何炳松(1890-1946)以現代歷史學、史學獨立性的角度誤讀章學誠。他們在經史對立的框架下解讀章學誠，忽略傳統史學的內涵。宋家復，〈詮釋的歷史與(歷)史的詮釋：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再理解〉，《九州學刊》，7：1(香港，1996)，頁21-70；許松原，〈專家與通識——章學誠的學術思路與錢穆的詮釋〉，《臺大歷史學報》，37(臺北，2006)，頁267-300。

⁵⁸ 《校讎通義》雖不是罕見的文本，但當時專門針對「校讎」的討論相對史學少許多。從黃兆強的整理可以發現，民初至1985年，相關研究都集中在史學。黃兆強的博士論文與修訂專書也不特別關注意錄學。他是另外討論章氏目錄學，作為專書附錄。他在該文指出，章學誠在目錄、校讎方面多是承襲前人。黃兆強，〈近現代學人章學誠研究述論——以章氏之史學、方志學及目錄學之貢獻及影響為例〉，收入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1920-1985》，頁362-363、372-376。

⁵⁹ 錢基博，《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上海：中山書局，1929)，頁1-2、47、61-62。

⁶⁰ 李永圻，張耕華，〈前言〉，收入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呂思勉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9冊，頁4。

介紹章學誠，其解讀幾乎不涉及校讎。⁶¹同樣作為授課講義，錢穆(1895–199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當時甚為流行。儘管錢穆對於章學誠史學的詮釋，與梁啟超及胡適不同，但他同樣重視並推崇章學誠之史學。⁶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偏重章學誠的「經史」思想，「校讎」的討論則相當簡略。錢穆認為「校讎非僅為目錄」，⁶³用他的話說就是：「校讎之用，可以評騭古今學術源流，分別諸家體裁義例，其事即無異於著作。」錢穆因為重視「歷史」，所以強調「源流」。他認為，章學誠的校讎學不僅僅是技術上整理資料的「札錄」、「著錄」或是「纂類」，而是用以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著作」。⁶⁴可見錢穆同樣是偏重章學誠的史學，並將校讎學視為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論校讎的短短篇幅中，是從史學、史學史的眼光看待校讎的意義與功能，目錄並沒有史學以外的意義。⁶⁵

在眾多討論者之間，歷史學家金毓黻(1887–1962)較為重視校讎學的獨立性，卻仍是從史學優先的角度出發。金毓黻出版於1941年的《中

61 呂思勉，〈序〉，《文史通義評》，收入呂思勉，《呂思勉文集》，第19冊，頁231–232；呂思勉，〈附錄一：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附錄二：《文史通義》選讀提要〉，《文史通義評》，收入呂思勉，《呂思勉文集》，第19冊，頁271–276。

62 許松原，〈專家與通識〉，頁267–300。

63 黃兆強，〈附錄三：錢穆先生章學誠研究術論〉，收入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1920–1985》，頁461。

6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327–328。

65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錢穆能夠掌握章學誠以專家、通識貫通經史的理念。但他也一定程度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簡化為「學術史」。如錢穆在1970年代授課時，曾相當白話地解釋「考鏡源流」為學問「開始怎麼樣，後來怎麼樣」，並強調學術史應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下工夫。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收入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408。

國史學史》，是他 1938 年在大學授課時的講義。他在史學史的架構中，特設一章討論「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明顯地，課名與篇名揭示這是在史學的角度下講述章學誠。他認為章學誠最特別的論點是六經皆史、記注與撰述之別、通史、方志學與校讎學。雖然，金毓黻相對重視校讎學，他明白指出章學誠在史學之外，還有理學、文學以及校讎學的貢獻，且他特別強調校讎學有「專業化」的趨向。但就整體而言，金毓黻仍將校讎視為次要。⁶⁶因此，他沒有深入地探討校讎學，僅在文末簡略說明《校讎通義》，並指出校讎為史學之「支裔」。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此提及《校讎新義》一書，但批評杜定友分別書籍分類與學術分類，所論「非有深湛之理據也……扞格難通」。⁶⁷總之，縱然上述導讀式書籍與大學講義，對章學誠的理解多有差異，但重視章學誠之史學則是共同的趨向。學者們大多賦予校讎「學術史」探究古今學術源流的意義，不願停留在「簿記之學」的層次。

(二)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

杜定友構思與創作《校讎新義》的 1930 年前後，目錄學相關討論都重視學術與思想的源流，更強調目錄學有超出單純圖書管理的層次。從杜定友 1921 年歸國，至《校讎新義》出版的期間，各種不同的目錄學說流傳於思想的市場之上，並發展至學者為其進行初步分類的程度。⁶⁸他們或堅持目錄學必須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拒斥單純登記資訊的目錄學；或是主張兼顧二者，不願捨棄中國目錄學的學術史特

66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310。

67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 332-333。

68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頁 9-16；汪國垣（汪辟疆），〈目錄學之界義〉，《藝林》，1（南京，1929），頁 4-12。

質。這其中也不乏具備西方目錄學知識的學者。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與杜定友的直接交鋒或間接指涉，皆凸顯了杜定友目錄學理念在當時的刺激性。

在當時，有不少學者認為學術史式的目錄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這可分別以著名經史學者張爾田(1874-1945)、就讀於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的張其昀(1901-1985)，以及僻處四川，與上海、北京等學術核心少有往來的劉咸炘為例。早在 1923 年，《學衡》刊登張爾田推介同有清代樸學淵源的好友孫德謙(1873-1935)《劉向校讎學纂微》的序文。張爾田曾強調「史家目錄，於道最高」，以此稱讚孫德謙的《漢書藝文志舉例》。⁶⁹張爾田《劉向校讎學纂微》序文指出，自劉向(77-6 BCE)以來便奠定了目錄學的任務與功能——洞明學術流變。因此：

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學術，及一家一書之旨趣。事乃與史相緯。……世之號稱目錄學家者……總總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錄之攷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為綱紀，固概乎未之有聞。

張爾田認為目錄不僅是書籍紀錄之考訂。他指出，目錄的重要性在於了解各時代、各家與各書的學術旨趣，這種功能是與「史」相輔相成的。尤有甚者，張爾田認為在剖析學術條流的目標下，即使章學誠仍有不足。章學誠僅是在四部的框架下「略附辨章之義」，未能發揚劉向之學的真正內涵。⁷⁰可見，張爾田與孫德謙堅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中國目錄創始以來的本質，也是現代需要發揚的理念。在他們眼中，中國目錄學確有不足，但不足的原因與杜定友正好相反——不夠著重於思想、學術的源流與意義。

張其昀的看法與張爾田相當接近。1922 年，張其昀在《史地學報》

⁶⁹ 張爾田，〈序〉，收入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 2 冊，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據四益官刊本排印)，頁 1697。

⁷⁰ 張爾田，〈劉向校讎學纂微序〉，《學衡》，24(南京，1923)，頁 1-2。

「故書新讀」的專欄上，發表〈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一文，其副標為「劉知幾與章實齋之史學」。文末建議大學歷史系，當以章學誠的互見與別裁之法，編成「史籍目錄」與「索引」。儘管張其昀認為目錄與索引，應該「精密易檢」，但其目的仍是讓學者「求其書，可以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⁷¹這相當明顯是以史學優先的角度討論目錄學。張其昀討論校讎時，也認同章學誠「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的說法。因此，校讎工作應是「由魚魯亥豕之細，恢弘至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矣」。總之，張其昀認同章學誠的學術史式目錄學的理念，也認為中國目錄之傳統與未來皆當如此。⁷²

最以學術史傳統繼承者自居的，莫過於近年受到學界重新發現的劉咸炘。劉咸炘一生極力闡揚章學誠的史學與校讎理念。⁷³1926年，劉咸炘於四川大學講授「目錄學」課程，課堂講義於1928年成書。⁷⁴《目錄學》多數內容來自劉咸炘作於1919年的《續校讎通義》，兩本書都是發揮章學誠的思想。⁷⁵劉咸炘強調目錄學的目的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又指出目錄學是用來「明書之體性與其歷史」。他認為編制目錄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諸群學」的工作。無可避免的，他延續章學誠的立場，反對簿記的目錄學，認為目錄學不能停留在「甲

71 張其昀，〈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劉知幾與章實齋之史學(續)〉，《史地學報》，1：4(上海，1922)，頁129。

72 張其昀，〈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劉知幾與章實齋之史學〉，《史地學報》，1：3(上海，1922)，頁146-147。

73 周鼎，《劉咸炘學術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45-47；歐陽禎人，《劉咸炘思想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45-51。

74 歐陽禎人，〈附錄二·劉咸炘年譜及主要著作〉，收入歐陽禎人，《劉咸炘思想探微》，頁306、308。

75 金毓黻批評《續校讎通義》，僅模仿章學誠之表面，沒有深刻思想。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333。

乙部次」的層次。因此，他批評當時市面上的目錄學「俗間亦有目錄學之稱，乃以多記書名為尚，是號橫通，僅同老賈，不足為學也。」⁷⁶儘管劉咸炘的思想在當時流傳較為侷限，仍有時人讀出他史學導向的立場。《目錄學》在 1936 年重刊後，有書評作者清楚意識到《目錄學》是資訊管理式目錄的對立面，指出劉咸炘討論的不是歐美圖書管理技術的目錄學。⁷⁷

同時期，就算是接觸與引介過西方圖書館學的學者，也堅持學術史式的理想，反對僅為簿記的目錄學。歷史學家傅振倫(1906-1999)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931 年，傅振倫在全國性的《圖書館學季刊》上，以「校讎」為名發表他對目錄學的看法。這篇文章雖多處採用英文目錄學專有名詞，但全然採納章學誠的觀點，認為自劉向以來校錄群書，部次條別，就是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更是發揚了以「學術」為重的目錄學理想。⁷⁸

總之，上述張爾田至傅振倫的說法，清楚顯示「學術史」的理想主導了時人對目錄學的構思與想像。因此，以資料管理為優先的圖書館式目錄學，在當時不受歡迎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以下幾位學者的說法，更具攻擊性地抨擊圖書館式目錄學。

首先，繆篆(1877-1939)在《廈大週刊》發表一篇文章，《圖書館學季刊》也為其撰寫簡介。繆篆高調地宣稱目錄學是史學的「附庸」。他其實清楚認識到，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發展多元，用處各異，既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包括：核對編目、考證內容差異、考證有目無書、目錄學家之沿革，以及歷代書籍之聚散。儘管如此，繆篆卻相當

76 劉咸炘，《目錄學》(收入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丁輯，第 1 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頁 233、270、297。

77 〈新書介紹：目錄學(劉咸炘著)〉，《學脈》，1：9(南京，1936)，頁 41。

78 傅振倫，〈校讎新論〉，《圖書館學季刊》，5：2(南京，1931)，頁 163-177。

看不起外國圖書館編目的方法，認為只是「圖書館資排列便出納之事」。他強調中西差異巨大，設計涵蓋中西的目錄與分類法，實為癡人說夢。在他看來，中國目錄學還是應該根據劉向的理念與辦法，「不必混入 Bibliography 之範圍也。」⁷⁹對於繆篆的說法，《圖書館學季刊》歸結得更直接：「圖書館便度列出納之事……非中國目錄學之本來面目也。」⁸⁰1931年，幾乎與《校讎新義》同時問世，中華書局出版了劉紀澤(1897-1957)的《目錄學概論》。⁸¹《目錄學概論》綜合採納當時關於目錄學的觀點，一定程度反映出此際流通的看法。劉紀澤最突出的個人立場，正是主張目錄學為史的「支與流裔」。他在書中特設一章「目錄學在史學上之位置」，強調目錄學出自古代史官，因此需要效法史學「剖析條流，推尋事迹」，不能「但記書名」。⁸²在史的關懷下，他同樣強調目錄之意義與功用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錄學家應該考證作者時代與學術特色，並且評價其學術優劣。這些都是目錄最重要的任務。⁸³因此，他批判當前之目錄學僅能「造簿計」，⁸⁴並強調：「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家之簿籍，自名賞鑑，圖書館之編目，取便檢查者異也。」⁸⁵總而言之，劉紀澤自詡為章學誠理念的繼承者，強調目錄的學術與歷史

79 繆篆，〈中國目錄學敘〉，《廈大週刊》，9：6(廈門，1930)，頁4-7。

80 鏡，〈時論撮要：目錄學：中國目錄學敘(繆篆)〉，《圖書館學季刊》，4：2(南京，1930)，頁314。

81 《目錄學概論》書後刊登了杜定友《校讎新義》的廣告。廣告稱《校讎新義》融會中西學說，「持論極為警惕，為近來學術界富有革命性之著作」。由此可見，這兩種極端的立場是同時出現於市面。見劉紀澤，《目錄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1)書末。

82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頁4、75-76。

83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頁25-26、41。

84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頁7。

85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頁38。

意義，批評僅停留在資訊登記層次，考量圖書館實務的目錄。

劉紀澤這番批評簿記之學的言論，可能來自中文系學界。1935年至1936年，《安雅》連載一篇相當長的目錄學文章。⁸⁶該文為武漢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周貞亮(1870-1932)生前未刊的文章。⁸⁷周貞亮在大學講授《目錄學》，相當早就投入廣義的目錄學。⁸⁸他以「書目」之名，為當時之目錄製作總目錄。要注意的是，該文刊登於「國學專著」專欄，專欄題字者，正是同樣反對目錄學僅是「部次甲乙」的章太炎。⁸⁹周貞亮該文大談傳統目錄學的發展，並直接批評部次甲乙的傳統藏書家與新式圖書館學。首先，他認為部次甲乙與計簿只是目錄附帶的一小部分，不能以此為「目錄學」。目錄之所以為「學」，必須是以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為主旨。接著，不同於其他學者以用途、性質分類目錄，周貞亮以分類之後有無小序與解題，將目錄分為三類，並指出分屬三類的各家目錄，都「必求足以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則無異議」。⁹⁰周貞亮總結說到，儘管三者各有主張，但旨趣、宗旨皆相同：「蓋吾國從來講目錄學者，其要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家之書目，徒以賞鑑；圖書館之書目，只以便檢閱者，不可同年語也。」⁹¹周貞亮從目錄學等於學術史的預設出發，

86 雜誌創辦人及主編為王葆心(1867-1944)，受過傳統學術訓練，且曾任北京圖書館總纂。

87 怡齋，〈時論撮要：目錄學〉，《圖書館學季刊》，11：2(南京，1937)，頁274。

88 宋傳銀，〈周貞亮文獻學成就述略〉，《人文論壇》，2015：0(武漢，2015)，頁365-372。

89 林少陽，〈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及其與章學誠的關聯〉，收入章太炎研究中心編，《章太炎研究的新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頁326-426。

90 周貞亮，〈目錄學(續第六期)〉，《安雅》，1：8(武昌，1935)，頁7。

91 周貞亮，〈目錄學(續第十期)〉，《安雅》，1：11(武昌，1936)，頁15。

抨擊無論是傳統藏書家，或新式圖書館學，皆僅登記書籍資訊，而無涉於求學以及「學術史」意涵的目錄。總之，儘管周貞亮論述的細節與前述學者有別，但結論仍殊途同歸地導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此可見，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流行的信念，讓學者們略過理論的論證，甚至僅僅淪於口號。

四、摻入學術史理念的資訊管理

上述張爾田、張其昀、傅振倫與周貞亮等人，多心存學術史的關懷，認為目錄有超過資訊管理層次的更高意義，因而貶低簿記之學。他們理所當然地相信，高層次的學術史任務，可以與技術層次的資訊管理和諧地融合在「目錄學」之中。然而，其中許多需要進一步梳理的矛盾，他們卻略而不談。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立場與杜定友較為接近的學者身上。以下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學者是以「資訊管理」為目標，大大闡述圖書資訊管理的理念、原則與方法。但他們仍不同程度地嘗試吸納、調和章學誠理念於其中，也因此展現與前述學者一樣的論述矛盾。

容肇祖(1897-1994)的論述相當具有代表性。容肇祖為著名思想史家，也具有相當豐富的目錄文獻討論。⁹²1928年，他根據英、美、法國「Bibliography」的發展與定義，發表〈中國目錄學引論〉一文。容肇祖開宗明義指出研究目錄學是有助於「檢查」。他認為，目錄學的研究對象是「書」，研究目錄學是為了「建設圖書館及編制圖書目錄」作準備。如此看來，容肇祖的看法似乎與杜定友相當接近。然而，容肇祖話鋒一轉，指出光討論書籍的「記敘、簿錄與保存」，未免「太注重於實用面向」。他引用章學誠之語，強調中國目錄學的特色正是

⁹² 如莞城圖書館編輯的《容肇祖全集》，便有一冊為「目錄文獻卷」。莞城圖書館編，《容肇祖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13），第8冊。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認為「學術」不僅是中國目錄之核心目標，也是當前目錄學所需。容肇祖的結論是：

目錄學的目的，是在知曉現在學術的發達，及往古學術的存亡。我們治目錄學者，當考證學術的源流與盛衰，提要鉤玄，給學者以考尋古今學問的門徑。我們記敘或簿錄一種的書籍，皆當有歷史的系統，使治學者便於窮竟源委，……⁹³

容肇祖這篇文章刊於中山大學的「圖書館」期刊，他與杜定友一樣，知悉西方目錄學，也知道目錄之對象為「書」，可以應用於圖書館。儘管如此，容肇祖最終還是以「歷史的系統」編制目錄，走向了目錄應該考究「學術」源流與存亡的結論。他雖想要綜合兩種目錄學，卻未能清楚交代，要如何整合圖書館實務與考究學術源流的目標。

1929年——正是杜定友《校讎新義》創作與出版的時刻——汪辟疆發表一篇體系完整的〈目錄學之界義〉。該文不僅為當時之授課講義，也於1934年收錄於《目錄學研究》專書中。⁹⁴汪辟疆有豐富的藏書與版本學經驗，他的立場其實偏向杜定友，並未史學化目錄學。汪辟疆強調目錄的對象是「書」，不可直接以「學」為對象，但他仍盡力調和兩者，並相當程度吸納學術史的功能與任務。首先，他將傳統目錄學觀點分為四種，其中最重要的二種，一是「目錄家之目錄」：「網紀群籍，簿屬甲乙之學也……取便尋檢而設，非有他深微含義也」；一是「史家之目錄」：

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目錄不僅為網紀群籍，簿屬甲乙而設，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學術，與夫一家一書之宗旨。……視目錄學之網紀群籍、簿屬甲乙者，則掌故令吏之所優為，而決

⁹³ 容肇祖，〈中國目錄學引論〉，《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5：4（廣州，1928），頁6。

⁹⁴ 汪辟疆，〈序〉，《目錄學研究》，頁1。

非目錄學者之所有事也。⁹⁵

汪辟疆清楚意識到，賦予目錄「學術史」意義與任務的目錄學家，相當輕視簿屬甲乙的目錄。汪辟疆也提醒讀者「史家之目錄」的弊病。他清楚知道學術史與目錄的界線，而言「條別學術者，本屬學術史範圍」，除了不能拘泥學術源流外，也不能忘記目錄本為：

紀載書籍之事，而以編纂學術史之天職，認為編纂目錄之天職，而目錄之本旨失矣。……視目錄為盡人所能為，而以綱紀簿錄之能事，責之於掌故胥吏之手，而目錄學之效用去矣。⁹⁶

汪辟疆自居為協調者，認為「簿屬甲乙」與「辨章學術，剖析源流」的兩種目錄可以並存，且應該相輔相成。他一定程度呼應杜定友，認為目錄應以書為對象，但汪辟疆仍強調不可捨棄學術的層面，單純「漫不經意掇拾書名」。目錄學者要具備學術史的眼光與能力，進而商榷類例，剖析流別，讓人們「即類以求其書，即書以求其學」，最終達到「周知一代之學術概略，與夫一家一書之宗趣」的目標。⁹⁷因此，應該融合史家目錄與目錄家之目錄，「斟酌於二者之間」。在此之下，目錄之定義便是：

目錄之學，乃有綱紀群籍範圍，而略涉辨章學術範圍。質言之，則以目錄家之目錄，而兼有史家之目錄。……目錄者，綜合群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錄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別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啟後世著錄之規，方足以當之。⁹⁸

⁹⁵ 另外兩種為：藏書家目錄，重版本校勘；讀書家之目錄，指示治學門徑。

汪國垣(汪辟疆)，〈目錄學之界義〉，《藝林》，1，頁4-5。

⁹⁶ 汪國垣(汪辟疆)，〈目錄學之界義〉，《藝林》，1，頁12。

⁹⁷ 汪國垣(汪辟疆)，〈目錄學之界義〉，《藝林》，1，頁11。

⁹⁸ 汪國垣(汪辟疆)，〈目錄學之界義〉，《藝林》，1，頁12。

這段話中，汪辟疆以「略涉」說明目錄之學術層面，又主張以目錄家「兼」史家之任務，加上前段強調不可以學術史之天職取代目錄之本旨。換言之，他雖然是以「紀載書籍」為目錄之本質，但仍吸收了「學術史」成分，不如杜定友般，拒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於目錄學之門外。總之，汪辟疆在意識到學術史與資訊登記有所差異的同時，也嘗試融合兩種目標，重新定義「目錄學」。

試圖調和學術史與資訊登記目標的學者，也直接點名批評杜定友。另外一篇與汪辟疆相似態度的文章刊登於圖書館學刊物。這篇文章具備更多的西方目錄學知識基礎，但也不滿意杜定友的極端立場。作者毛坤(1890-1960)出身於中國第一間圖書館專門學校——武昌文華大學圖書專科。毛坤畢業後創設檔案管理專科，任職四川大學期間擔任過圖書館館長，也講授目錄學與編目學課程，他被當代學者視為圖書館學家與檔案學家。⁹⁹在文章中，毛坤討論中國目錄學發展，留意西方目錄學傳入後，中國目錄學出現的變化。他整理、條列包括鄭樵、杜定友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共十六種分類法。他指出，中國「舊目錄學家」一般認同目錄的功用是章學誠所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新起」之目錄學家則重視「檢查之便」，反對前者的主張。¹⁰⁰他指出，杜定友與另一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屬於後者，僅將目錄視為「閱者檢查藏書之工具」。儘管區分了「新舊」，但毛坤細分目錄冊與目錄的差別，認為目錄不僅僅是目錄冊，他批評杜、劉二人的看法僅是

⁹⁹ 羅中樞，〈弘揚校友精神，建設四川大學——在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周年暨圖書館學和檔案學史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收入黨躍武、姚樂野主編，《毛坤先生紀念文集：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周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

¹⁰⁰ 毛坤，〈目錄學通論（待續）〉，《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1：2（天津，1934），頁 18、21。

「catalog」(目錄冊)而非「bibliography」，目錄應該是以 bibliography 包含 catalog 在內。¹⁰¹換言之，毛坤同樣是圖書館學者，但他並不採取狹義的目錄學定義，而是強調目錄既然涉及類例與源流，便需要「學術史」的幫助。¹⁰²反過來說，若是編目得當，目錄也可以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益處。¹⁰³因此，他反對將「目錄學」(cataloging)、「書目學」(bibliography)分得太開，因為兩者實際上很難區分。他批評杜定友刻意區別二者「乃名詞之爭，非內容之爭」，實屬無謂。¹⁰⁴

在調和兩種目錄學觀點的道路上，姚名達往前一步給予目錄學更強的主體性。約在 1934 年左右，姚名達出版了體系相當完整、涵蓋範圍以及篇幅都最大的《目錄學》專書。他與杜定友抱持相同的關懷，也有許多與杜定友類似的觀點。姚名達的焦點明顯集中於圖書資訊管理，甚至因此遭受批評。¹⁰⁵他在書中探討目錄的歷來發展；分類、篇目的差別；編目的原則與具體方法；當前圖書卡片、索引與檢字法的優劣得失等等。姚名達也強調目錄有助於找書。¹⁰⁶他意識到目錄是圖書的鑰匙，與圖書館具有緊密的關係，因此以專章處理二者的關聯。¹⁰⁷重要的是，

101 毛坤，〈目錄學通論(待續)〉，《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1：2，頁 20-21。

102 毛坤，〈目錄學通論(續完)〉，《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1：3(天津，1934)，頁 42。

103 毛坤，〈目錄學通論(待續)〉，《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1：2，頁 21。

104 毛坤，〈目錄學通論(續完)〉，《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1：3，頁 42。

105 一篇關於姚名達《目錄學》的書評，批評他過度著重目錄「方便稽查」的一面。孝孟，〈目錄學〉，《大公報》，1934 年 3 月 17 日，第 11 版。

106 姚名達，《目錄學》(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第 4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商務印書館 1934 年版影印)，頁 14。

107 姚名達，《目錄學》，頁 10-13、29、38-46。

姚名達同樣警覺章學誠的理念，容易使目錄與學術史混淆。¹⁰⁸然而，他吸納了章學誠所言，指出若只是以「部次甲乙，著錄名目」為目錄學，「假使章學誠至今尚在，他的驚怪抨擊更不知像什麼樣子」。¹⁰⁹姚名達顛覆了目錄學與歷史學的主從關係，強調歷史學是目錄學的輔助學科，¹¹⁰並為目錄學作了如此定義：「將羣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¹¹¹由此可見，《目錄學》儘管旨在建構一個宏大的目錄學體系，但卻仍受到章學誠梳理學術史的核心理念束縛。值得注意的是，姚名達知悉杜定友的相關觀點。如他的目錄學年表羅列杜定友的數部著作，包括《校讎新義》。¹¹²但他明白反對杜定友的分類法與檢字法。¹¹³雖然重視圖書館，但姚名達不將目錄學的範圍限縮在圖書館實務。1935年至1937年，姚名達將《目錄學》改寫為《中國目錄學史》時，不但延續上述的定義，更點名批評杜定友的說法「界義殊不清晰」。¹¹⁴

最後，我們來看與杜定友最接近，甚至直接沿襲杜定友的相關說法。這些討論儘管是持資料登記與便於查找的立場，卻又生硬地混入杜定友反對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理想。首先，1933年，一位署名仲蘇的作者，在西安隸屬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西京日報》，其附刊《讀書週刊》分兩期發表〈目錄學及其基本問題〉一文。他同杜定友一樣，是從圖書館實務的角度出發，探討目錄學的功用與性質。

108 姚名達，《目錄學》，頁10、28。

109 姚名達，《目錄學》，頁8。

110 姚名達，《目錄學》，頁33。

111 姚名達，《目錄學》，頁9。

112 姚名達，《目錄學》，頁170。

113 姚名達，《目錄學》，頁144、231-232。

114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頁8、16。

文章的開端，他提出在圖書館中讀者與館員會遇到的七個實際「查書」、「找書」問題。前六個問題與杜定友的看法完全一樣。仲蘇如同杜定友指出目錄是「圖書館的鑰匙」。因此，他強調圖書館的目錄就是要方便查找。他大篇幅說明圖書館編目的原則與方法，並介紹卡片的種類與利用方式。¹¹⁵這樣看起來，他的立場與杜定友甫歸國時，幾篇討論圖書館與目錄的文章相當一致。然而，就算接近杜定友，仲蘇仍不滿足於單純的圖書管理層次。相較杜定友提出的實務問題，該文加上了「某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一條。「書的內容」正是杜定友《校讎新義》排除在目錄學之外的。此外，仲蘇在文章中，特別指出目錄學同時包括四種定義：「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辨章學術，剖析源流」、「鑑別舊槧，校讎異同」與「提要鉤玄，治學涉徑」。接著，他將目錄分為廣義與狹義，認為兩義都可以算是目錄學：

(廣義)參稽古今載籍存亡之數，考鏡師儒學術盛衰之源……(狹義)可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的古今，標卷部的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換句話說，凡能使其做到那兩種工作的學識，都可以叫他做目錄學。¹¹⁶

由此可見，仲蘇其實持一種折衷傳統的態度。儘管他主要在說明圖書館式登記資訊的目錄學，但仍將中國「傳統」考鏡學術、辨偽、校勘的考量都納入其中。無怪乎，他認為目錄學不僅能夠解決上述七個找書問題，也著重學術的源流，用以考辨學術。文末，更是引用張爾田「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

115 仲蘇，〈目錄學及其基本問題〉，《西京日報：讀書週刊》，8(西安，1933)，頁 29-31；仲蘇，〈目錄學及其基本問題(續)〉，《西京日報：讀書週刊》，9(西安，1933)，頁 33-34。

116 仲蘇，〈目錄學及其基本問題〉，《西京日報：讀書週刊》，8，頁 30-31。

緯」，並且應該「剖析條流，以為綱紀」的說法作結。¹¹⁷

隔年，《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設「圖書與圖專學專號」。該期刊登如〈籌設圖的原則〉與〈圖書之選擇與訂購〉這類現代圖書館學的討論。光就專號與文章標題採用杜定友發明的「圖」字，指涉「圖書館」，理應是擁護杜定友的立場，從圖書館角度出發的討論。其中，林頌齊〈用目錄的話〉一樣採用「圖」字。他從圖書館的立場，「檢查派……為閱者檢查藏書的工具」的角度，闡發將目錄視為一種「工具」的看法。林頌齊強調西方將目錄視為圖書館之鑰匙，他並說明與提倡卡片目錄的編制與使用。然而，展開論述以前，林頌齊仍先說明，中國對目錄的看法「遠要神聖」，並為一種「專門學問」。他引用張之洞(1837-1909)的說法，指出目錄是一切學問的門徑，並具有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考量。換句話說，這篇文章儘管是闡發資訊管理的目錄學，仍點出中國的目錄不只是工具，還有「學術」的「神聖」一面。¹¹⁸

1936年，另一種調和目錄學不同任務的嘗試，是從中國目錄與目錄學發展史的角度，將中國歷來學術史意義與資訊管理的技術層次，全部歸宗於劉向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霍衣仙發現史學家視目錄為「天神」，認為目錄學為一切學術的總匯與淵源，並主張「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到六朝以後的簿錄家致力於便利地使用、檢查書籍。依霍氏之見，史學家與簿錄家雙方對目錄學的定位分別為：「史學家以學術為對象，視目錄學為一部文化史，簿錄學家以書籍為對象，便於檢查書籍就得了。」他並強調，簿錄家的目錄學定義，是「現時有了圖書館學，才正式揭發此義」。¹¹⁹然而，從以上討

117 仲餘，〈目錄學及其基本問題(續)〉，《西京日報：讀書週刊》，9，頁34。

118 林頌齊，〈用目錄的話〉，《時事新報》，1934年10月28日，第11版。

119 霍衣仙，〈目錄學的始祖劉向〉，《培正中學圖書館館刊》，3：1(廣州)，

論可見，章學誠賦予目錄「學術」、「史」的任務，即使是同以圖書館學為出發點的學者，也都在其論述中，安排「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位置。總而言之，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一語，強調目錄與目錄學的「學術史」意義，廣泛地影響了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之間，討論目錄學的學者們。這些學者帶著不同的背景與關懷投入「目錄學」。然而，他們大多殊途同歸，不同程度地採納章學誠的目錄學理想。

五、結論

杜定友以建設現代圖書館事業為人生志業。他將目錄視為圖書館實務的一種工具，著重在圖書資訊的登記、稽查與查閱。因此，他關注的問題自然與心懷建設歷史系、書寫學術史、整理與指導國學的學者不同。當時多數學者，或發揚章學誠的目錄學理念，強調目錄梳理學術源流的責任，將目錄作為一種學術史；或是儘管建設新 / 西式目錄學與圖書館，卻也吸納與調和學術史特質與任務。相較於他們，杜定友嚴拒目錄學擔負學術史甚至是道統的任務，試圖將這些責任排拒在目錄學的門牆之外。為了嚴格將學術史排除在外，杜定友對目錄的定義與論述多有矛盾、不清之處，正如本文第三、四節討論的批評者所言。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杜定友是否成功劃清目錄與學術史的界線，《校讎新義》確實以激烈的立場點出現代目錄的一大問題：目錄的任務與責任究竟是「考鏡源流」或「資訊管理」？雖然由於學界深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預設影響，杜定友撰寫《校讎新義》的意旨仍然受到忽視與誤解。¹²⁰這使得學界始終忽略杜定友這種與章學誠極端

1936)，頁 1-8。

¹²⁰ 學者指出《校讎新義》在 1949 至 1980 年間少有再版與刊印機會；1990 至 2000 年代，該書不僅在古籍出版整理時受到忽略，也不被登錄在相關書目

對立，大力抨擊以學術、歷史為關懷的目錄學，拒斥目錄學應具有學術史意義的見解。由此可見，杜定友有一套強烈、極端的論點，與時人的看法大相逕庭。但其產生的效果，可能仍侷限於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的領域中。然而，杜定友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出的挑戰，確實在部次甲乙、簿記的圖書資訊式目錄學，以及學術史式目錄學之間，劃下一道清楚甚至武斷的鴻溝。杜定友與其展現的目錄學爭論給予我們一大啟示：中國「現代」目錄學究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念與作法，而「學術史」理念是不是目錄學本有與應有之義，是可以提出討論的。另一方面，假使要結合學術史與資訊登記兩種任務，目錄學仍需要更精緻細微的理論辨析。當代中國學者討論目錄學時，儘管多數仍強調辨章學術與考鏡源流的學術史任務，但也有反省學術史式目錄學的說法。他們批評章學誠的主張混淆了學術史與目錄學，目錄學的任務是針對書籍之收藏與取用便利，而非描述學術之發展。他們注意到學術史式的目錄學壓縮並混淆了目錄「揭示」與「檢索」的功能。甚至有學者認為，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為目錄學的宗旨，其實反而是對目錄學本身內容的否定。¹²¹總之，上述學者如同杜定友般區分

之中。易凌、龔蛟騰，〈《校讎新義》的成書、版本與傳承考略〉，頁 86、87-88。至於誤解方面，兩岸各有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970 年代，在臺灣支持章學誠觀點的楊家駱，錯將杜定友《校讎新義》歸入章學誠校讎學系統。1980 年代，中國學者彭斐章編輯《目錄學研究文獻彙編》，誤解《校讎新義》為「側重古典目錄學之內容」。楊家駱，〈序〉，收入楊家駱主編，《校讎學系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頁 3；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彙編》，頁 533。

121 李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批評〉，《圖書館學研究》，1998：6（長沙，1998），頁 91-92；王國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評判——中國古典目錄學價值重估〉，《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3（鄭州，1991），頁 77-81。有目錄學學者一方面相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確實為中國目錄學的傳統，但也認為現代目錄學應當「批判地繼承」

目錄與學術史，他們認為應當單純化目錄學的功能與宗旨，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任務交由學術史來負責。由此可見，自《校讎新義》出版以來，這種目錄學構想上的衝突與矛盾一直延續至今，值得進一步探索。

(本文於 2025 年 10 月 28 日收稿；2026 年 1 月 28 日通過刊登)

*本文構思與寫作過程中，承蒙多位師長與學友惠予指教，謹致謝忱。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細緻而中肯之建議，俾使本文更加周延。

這套傳統，「揚棄」學術史任務。程煥文，〈中國目錄學傳統的繼承與揚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批判〉，《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6：4(天津，1996)，頁 14-20。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出版史料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收入《余嘉錫著作集：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
- 余嘉錫，《余嘉錫著作集：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呂思勉，《文史通義評》，收入呂思勉，《呂思勉文集》，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李繼先、金敏甫、李小綠、萬國鼎原案，〈訂定中國圖書館學術語案〉，收入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委員會編，《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報告》，南京：中華圖書館協會事務所，1929，頁156-158。
- 杜定友，《百城生活》，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18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
- 杜定友，《校讎新義》，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第42冊，上海：上海書局出版社，1991，據中華書局1930年版影印。
- 杜定友，《圖書分類法》，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2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
- 杜定友，《圖書目錄學》，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2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
- 杜定友，《圖書館通論》，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3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
- 杜定友，《圖書館學概論》，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第3冊，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
- 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沈祖榮著，丁道凡搜集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杭州：杭州大

- 學出版社，1991。
-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
- 姚名達，《目錄學》，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第47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 胡適著，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章實齋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發行，2020。
- 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 張爾田，〈序〉，收入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收入《二十五史補編》，第2冊，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據四益宦刊本排印，頁1697-1698。
- 莞城圖書館編，《容肇祖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13。
- 劉咸忻，《目錄學》，收入劉咸忻，《推十書(增補全本)》，丁輯，第1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 劉紀澤，《目錄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1。
- 劉國鈞著，史永元、張樹華編，《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 錢基博，《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上海：中山書局，1929。
-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收入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2009。

(二) 報紙、期刊

- 《大公報》(天津)。
- 《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廣州)。
- 《史地學報》(上海)。
- 《申報》(上海)。
- 《安雅》(武漢)。
- 《西京日報：讀書週刊》(西安)。

-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月報》(天津)。
《時事新報》(上海)。
《培正中學圖書館館刊》(廣州)。
《無錫國專年刊》(無錫)。
《廈大週刊》(廈門)。
《圖書館學季刊》(南京)。
《學觚》(南京)。
《學衡》(南京)。
《藝林》(南京)。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國圖書館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王阿陶，《民國時期圖書館社團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全根先，《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家傳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李立民，《晚清目錄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周鼎，《劉咸炘學術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柯平，《從文獻目錄學到數字目錄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倪梁鳴，《民國目錄學研究：以傳統目錄學為中心》，北京：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22。
桑兵、關曉虹主編，《分科的學史與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陳曉華，《清代目錄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0。
彭斐章等著，《數字時代目錄學的理论變革與發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湯綯，《清初藏書家錢曾研究》，臺北：漢美出版社，1991。
黃兆強，《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

- 黃增章、楊恆平，《中國圖書館事業開拓者：杜定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 楊家駱主編，《校讎學系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
- 趙飛鵬，《藏書家與古文獻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
-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北縣：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 劉蕾，《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歐陽禎人，《劉咸忻思想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 韓永進主編，《中國圖書館史(近代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 Blair, Ann.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ullaney, T. S.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7.

(二) 論文

- 丁道凡，〈序二〉，收入沈祖棻著，丁道凡搜集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棻先生文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頁4-6。
- 王重民，〈後記〉，收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407-425。
- 王國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評判——中國古典目錄學價值重估〉，《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3(鄭州，1991)，頁77-81。
- 宋家復，〈詮釋的歷史與(歷)史的詮釋：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再理解〉，《九州學刊》，7：1(香港，1996)，頁21-70。
- 宋傳銀，〈周貞亮文獻學成就述略〉，《人文論壇》，2015：0(武漢，2015)，頁365-372。
- 李永圻，張耕華，〈前言〉，收入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呂思勉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9冊，頁1-4。
- 李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批評〉，《圖書館學研究》，1998：6(長沙，1998)，頁91-92。
- 李勤合，〈「續」「新」糾葛：學術轉型中的《續校讎通義》與《校讎新義》〉，《儒藏論壇》，16(成都，2022)，頁121-154。
- 易凌、龔蛟騰，〈《校讎新義》的成書、版本與傳承考略〉，《高校圖書館工作》，2021：6(長沙，2021)，頁84-91。
- 林少陽，〈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及其與章學誠的關聯〉，收入章太炎研究中心編，《章太炎研究的新展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頁326-426。

- 范旭艷，〈杜定友《校讎新義》與傳統目錄學之知識分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廣州，2019)，頁 145–153。
- 倪梁鳴，〈論 20 世紀中國目錄學成就〉，合肥：安徽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7。
- 許松原，〈專家與通識——章學誠的學術思路與錢穆的詮釋〉，《臺大歷史學報》，37(臺北，2006)，頁 267–300。
- 喬好勤，〈略論 1911–1949 年我國目錄學〉，收入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彙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頁 322–326。
- 程煥文，〈中國目錄學傳統的繼承與揚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批判〉，《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6：4(天津，1996)，頁 14–20。
- 程煥文，〈序〉，收入杜定友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杜定友文集》，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第 1 冊，頁 1–32。
- 嘉瀨達男，〈余嘉錫『古書通例』『目錄學發微』の版本と成立過程〉，《人文研究》，124(小樽，2012)，頁 231–260。
- 羅中樞，〈弘揚校友精神，建設四川大學——在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周年暨圖書館學和檔案學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收入黨躍武、姚樂野主編，《毛坤先生紀念文集：紀念著名圖書館學家和檔案學家毛坤先生誕辰 110 周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
- 嚴佐之，〈前言〉，收入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21。
- Blair, Ann. "Foreword."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ited by 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xv–x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Dai, Lianbin (戴聯斌). "China's Bibliographic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Book History* 17:1 (2014): 1–50.
- Detwyler, Anatoly. "Twentieth-Century Bibliographies."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ited by 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500–50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Liao, Jing. "Chinese–American Alliances: America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ystem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 25:1 (March 2009): 20–32.
- Liao, Jing.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Academic Library in China: Western Influences and

- the Chinese Response.” *Libraries & Culture* 39:2 (Spring 2004): 161–174.
- Rusk, Bruce, Xiao Liu. “Bibliographies and Indices.” In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edited by Jack W. Chen, Anatoly Detwyler, Xiao Liu, Christopher M.B. Nugent, and Bruce Rusk, 475–4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Wang, Fan (王璠). “The Cornerstone of Scholarship: Library Catalogu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rivate Libraries and their Documentation, 1665–1830: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Sources*, edited by Jagersma, Rindert, Helwi Blom, Evelien Chayes, and Ann-Marie Hansen, 349–367. Leiden/Boston: Brill, 2023.
- Yi, Zhixian (易治賢), and Kim M. Thompson. “A Case Study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Building of China’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 Culture* 50:1 (2015): 51–69.
- Zhang, Mindi (張敏迪). “Organizing the New World of Print: Library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Business at the Commercial Press, ca. 1900 to ca. 1940.” *Twentieth-Century China* 50:1 (January 2025): 3–24.

**Beyond Zhang Xuecheng:
Du Dingyou's *New Meanings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Bibliograph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Wen-hao Chiu

Postdoctoral Scholar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umerous attempts were made to define bibliography as a modern discipline. Most scholar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examining the origins,” contended that bibliography should ideally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Du Dingyou’s 1930 work *New Meanings of Bibliography* has long been read as representative of this approach. This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Du was in fact strongly opposed to assigning bibliography such a responsibility. He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and task of “modern” bibliography should instead center on the registr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ook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ir inspection and use by libraries and readers. To pursue an intellectual-historical role for bibliography, he maintained, would be to forsake its proper function. The debate between Du and the advocates of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examining the origins,” may appear to b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or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pproaches, but it actually reflects two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ibliography and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Du Dingyou, *New Meanings of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Zhang Xuecheng,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examining the origins”